

北京大学中文系
简史

(1910-1998)

马越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

(1910—1998)

马 越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FF10/27 36

书 名：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1910—1998)

著作责任者：马 越 编著

标准书号：ISBN 7-301-03379-6/K0227

出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排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室

印 刷 者：北京经纬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875印张 97千字

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10.00元

序 言

温儒敏

北京大学中文系终于有了一本系史,而且又能赶在百年校庆的热闹氛围中出版,是值得欣慰的事。

这个系从1910年正式设立,至今已有88个年头,无论在本校或在全国,都算是“老资格”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个系涌现出许多大师级的学者,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无论其最早把中国语言文学作为独立学科而创设的教研体系,还是后来几经变迁的系科设置,对于现代中国的语言文学教育,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现今的北大中文系拥有中国语言文学的3个专业和5个重点学科,还有7个博士点,在全国相关的中文系科中仍然起着排头兵的示范作用,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学术声望。所以北京大学中文系系史的出版,不仅有纪念意义,更有学术价值;不仅本系的师生校友会关注,相信诸多关心中文系科乃至关心现代教育史、学术史的朋友也会有兴趣。

这部系史篇幅不长,材料也不够齐备,有待补充的地方还很多,但北大中文系88年来的历史发展轮廓第一次呈现出来了。这部简史的特色在于其紧紧围绕教学与科研这条线索,理清在系科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学术倾

向、教研模式的变迁及其得失。这又可以看作是一部学术史和教育史,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系科沿革史。通常说,一本好的传记,往往可以通过一个人看一个时代;那么,这部系史所追求的似乎是通过一个系来透视一门学科的历史变迁。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北大中文系的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包括几代学人的学术命运,都折射出特定时代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思潮的嬗变景观。北大中文系走过许多曲折坎坷的道路,她的历史图景中也曾有过不光彩的暗影,但那种自由、宏放、严谨、求真的学风,始终未曾放弃,可以说这是一种生生不息、代代薪传的“系格”。而这种“系格”也是源于北大兼容并包、科学民主的学术精神。读这部系史,会引发历史的厚重感和传统的延续感,并且不能不认真思索今天,强烈感受到中文系乃至人文学科所面临的历史挑战。

系史的写作并非易事,因为有许多具体事件的评述可能引起不同的意见,牵扯到这样那样的关系。沉淀了的东西比较好处理,因为可以较为冷静地使用历史的眼光,而当历史的距离未能拉开,评述起来就比较困难。这本系史的前半部分写得比较完整,后半部分有些粗放,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例如,五六十年代教育体制的弊病及其根源,“文革”及其后影响中文系学科发展的诸多大事,简史都来不及展开。八九十年代的部分大都只是记载而避开议论。我对这些部分也不满意,但能体谅其写作的困难。这部小册子出版后肯定会有各种批评,我想这总比没有反响要好,已经有一部系史也总比没有要好。如能从建设性的角

度来看问题,容忍不完满,就比较好办。集体编写历史的方式往往很难实施,为什么不能鼓励个人写作呢?

这部系史的编著者马越同学 1995 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因成绩优秀,被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我是她研究生阶段的指导教师。两年前,在一些老师的支持下,我建议她以北大中文系系史作为学位论文的题目。马越同学是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选择系史作为学位论文,超越了其所属的专业,而系史的写作涉及到文学史、语言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等诸多方面,也可以说是跨学科的研究,这对于她来说,是有些吃力的。我自己虽然在中文系任教多年,其实对系史也不甚了解,只是相信这个选题很有价值,而跨学科的“越轨”,对于训练学生的研究方法 with 眼光,也可能大有好处。马越同学非常合作,她的学风严谨扎实、思路也比较开阔。在写作过程中,她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做了许多重要的史料梳理工作,并有幸得到陈平原、孙玉石、钱理群等老师的指导和帮助。所以一开始这部系史的写作目标就比较明确,方法也比较对头。尽管有些地方写得比较简略,可议之处也不少,毕竟已大致达到了原先所设定的目标和要求。这部系史作为马越同学的硕士论文,在答辩时得到了答辩委员会(由费振刚、孙玉石、陈平原、王景山、温儒敏 5 位教授组成)一致的好评,此后又作了一些删改。应该感谢北大中文系领导以及诸位老师对马越这部系史写作的关照。

马越同学已经顺利完成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业,很快就要告别燕园,赴美继续攻读学位,她说还有兴趣围绕现

代学术史做些研究。我祝愿这位诚挚聪明的女孩在学业上能取得更出色的成绩,也期待着今后有人能超越这本简史,对北大中文系的历史做出更完整的总结。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部系史的初稿答辩后,因考虑还要作较多的补充与修改,曾打算先内部少量印行,但北大百年校庆在即,许多中文系的校友将返校聚会,不如改为公开出版,也算作是献给百年校庆的一份礼物,同时可以让更多的朋友能藉此回顾北大中文系的历史途程,还可以更广泛征求修改的意见。读者不妨把这本小册子看作是一种“征求意见稿”。

1998年4月18日于京西镜春园且竹居

目 录

序言	温儒敏 (1)
第一章 建立与发展(1910—1936)	(1)
一 早期的系科建设与新的学术规范 的建立	(1)
二 新文化运动中的北大国文门(系)	(11)
三 课程设置与学术制度的建立	(17)
第二章 特殊时期与历史转折(1937—1952)	(30)
一 西南联大时期	(31)
二 回京复校(1946—1948)	(41)
三 历史转折(1949—1952)	(45)
第三章 五六十年代和“文革”时期 (1952—1977)	(49)
一 教学改革	(49)
二 学术讨论与学术批判	(55)
三 “跃进”和调整	(59)
四 “文革”十年	(63)
第四章 新时期(1978—1998)	(68)
一 80年代	(68)
二 90年代	(75)
附录 1 北京大学中文系大事年表 (1910—1998)	(84)

附录 2 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届系主任名录	(139)
附录 3 参考文献	(141)
后记	(144)

第一章 建立与发展(1910—1936)

一 早期的系科建设与新的 学术规范的建立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并无系科之划分。戊戌变法后,大学堂正式开学,当时只设仕学馆,课程偏重于圣经理学,设诗、书、义、理四堂,春秋二堂,其形式、内容皆与传统的书院教育相仿。

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现代化转型肇发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颁布的“壬寅学制”,即由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拟定的《钦定大学堂章程》。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规定的完整学制,但并未正式颁行。1903年,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共同对学堂章程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学堂章程即《奏定大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这个学制被正式刊行并一直沿用至清末。《奏定大学堂章程》中规定:大学堂分大学预备科、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院(分别相当于后来的预科、本科和研究生院),大学专门分科科下分学门(即后来的系),其中,文学科大学分

为9个学门,内有中国文学门。当时中国文学门的主课^①有: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补助课程有:四库集部提要、世界史、中国历代法制史、汉书艺文志注补、外国语文、隋书经籍志考证、御批历代通鉴、各种记事本末、西国文学史、外国科学史,这是至今可考的最早的课程设置情况。但在当时,大学分科和科下分学门的规定其实仅体现于课程设置上,即在大学堂内部分设不同科目,并有所侧重地安排不同的教学内容,而并非真正有了各自独立的系别建制。系科作为一种独立的组织形态开始在北大建立,应从1910年分科大学正式开办算起。

值得注意的是,1903年中国文学门的课程设置已开始使文学教育体现出一种现代的观念。1903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规定,中国文学门师生在讲习主课之一“周秦诸子”时,“当论其文,非宗其学术”,明确地将文(词章之学)与哲(义理之辨)两者予以区分。同时又指出:“博学而知文章源流者,必能工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毋庸课习。”这其实是一种新的文学教育观念,即认为作文技巧的掌握和写作水平的提高,都应以对文章源流进行考辨的文学史研究为基础。基于此,《奏定大学堂章程》中特别规定:中国文学门的科目中除传统的考据、词章之学外,还应设置“历代文章流别”一科,并指明应以日本已有之《中国文学

^① 《光绪二十九年学科设置及课程安排》,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史》为参考,由教员自行编纂讲授^①。《奏定大学堂章程》中的这一内容在1903年的课程设置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这意味着文学史作为高等学校文学教育的中心课程,随学部章程的确立而确立。其时,已有日本笹川种郎的《支那文学史》行世。1904年,京师大学堂国文教习林传甲借用笹川种郎的思路,依照《奏定大学堂章程》中所规定的文学研究法的基本框架,写成中国最早刊行的文学史^②。文学史这一新学科的正式建立,对于本世纪的中国文学教育有着重大的影响,它标志着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的中心从传统的追求成一家之言的体(体裁)、式(格式)之学演变为注重对各代文学变迁的总体把握和以清理、总结为目的的“流别”之学。这种转变与其说是学者学术思路的变化,不如说是为适应现代教育体制改革的要求和教育普及的需要而建立起的新的文学教育方式。在此基础上,一种“经纬”(以文学史为经,以各时代诗文词曲并文辞要籍为纬)式教育法逐渐确立并构成了本世纪文学教育的基本模式。以时代作为把握文学发展中心思路的著述方式和教学理念,无疑对文学基础知识的普及有重大意义,但同时,文学史作为一种新的、应运而生的学科对象、教学体制和著述体裁,也在不同层面上对本世纪的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产

① 以上所引见《大学堂章程》,《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

② 单行本《中国文学史》于宣统二年(1910年)六月由武林谋新室出版,原为林传甲光绪三十年(1904年)于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馆讲授中国文学课程时所写授课报告书。

生了相当复杂的、值得深入研究的双重影响。

1910年3月,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开办,文科中设立了学制为4年的中国文学门(简称“国文门”)。自此,文学(包括汉语语言)研究正式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中的专门系科之一。这也是传统的中国文学研究走向专业化、规范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民国元年(1912年),京师大学堂易名为北京大学校后,学制渐趋完善,文学门内有国文学类与言语学类之分。国文学类的课程在1903年的基础上又有所扩充,计增加的课程有:希腊罗马文学史、近时欧洲文学史、哲学概论、美学概论、世界史、伦理学概论、尔雅学、言语学概论、中国史等^①,其范围已从传统的经史、诸子之学扩展到更大范围。1913年11月,文科国文门共有旧班学生32人毕业,这些平均年龄近43岁的本科大学生即为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的第一批毕业生^②。同年暑假后,北京大学新招分科学生入学,文科中仅招收了中国文学一班。1917年1月蔡元培正式就任校长后,到1917年11月,本科国文门共计有学生109名^③。当时的国文门,学生数量很少,每个年级大概只有二三十人,1918年仅录取新生6名、选科生3名,而且从教师到学生,全是清一色的男性。直到1920年北大开放女禁后,才开始有女生进

① 《大学文科之科目:文学门国文学类》(1912年),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② 见《国立北京大学第一届毕业同学会简章及同学录》(1913年),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③ 《本科学生名次表》,《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1月23日。

入国文系做旁听生^①。

1910年分科大学的开办和中国文学门的正式设立,不仅是教育体制上的演进,也是中国文学研究走向专业化、现代化的发端。从此,文学研究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中的专门学科之一。传统的国学研究专业性模糊,文、史、哲不分,体现在教育上,便是以儒家经典为基本教材,义理、词章、考据三学兼修。明清的书院教育重理学,尤其强调治学与修身并重,以培养经世济用的通才为目标。1911年辛亥革命后,专制政体被推翻,儒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改革教育、创造新文化成为一时之需。当时的学界学术思想相当活跃,由于西学的大量引进,学者的思路也比较开阔。许多学者自觉参考西方的治学方法,力求突破现有的学术研究格局,开拓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在教育思想上也有许多改革与创新之举。民国成立,新的学制《大学令》(1912年)确立后,大学实行专业化教育,以培养专才为目的,人文科学领域被明确区分为文、史、哲等专科。1919年,北京大学废门改系,采用系别建制,并率先建立了学术研究机构。在这些方面,北大国文系由于聚集了一大批著名学者而当仁不让地为一时之先。除了个人的专门贡献外,以下与系科相关的活动也都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早期对国文门学风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之一是教员

① 第一个进入北大国文系作旁听生的女生是来自安徽歙县的程〔 〕若,时年26岁。参见《文本科女学生履历一览表》,《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11日。

的聘任。从1913年11月起,胡仁源担任了北大校长,负责主持校务。在此期间,他陆续增聘了一批教员,对本科进行调整和充实。1914年,夏锡祺被任命为北大文科教务长。在此之前,姚永概充任文科教务长,崇尚“因文见道”、“文道合一”的桐城派学风在北大文科居明显优势,京师大学堂教习林纾、马其昶、姚永朴等均为桐城派学人。夏锡祺主持北大文科后,章太炎一派的学者如黄侃、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等陆续被聘来北大。这一代学者的研究承继了清代朴学的传统,注重考据训诂,析事论理力求准确,以治学严谨著称。这种学风以后逐渐成为北大文史科教学与科研的主流。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后,又首先从文科入手对大学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其中一项重要的举措是聘请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7年1月,陈独秀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学长一职,其于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杂志随之由上海移至北京。身为刚刚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一经就任,便竭力鼓励新文学,与北大的新派教员一起大力提倡文学革命,并努力建设中国文学门。措施之一是在1917年秋,由国文门中调出一部分不适合担任国文门教学的教员,会同国史编纂处一部分编纂员,另组为中国史学门。这对于当时国文门的发展,无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同期,国文门又进一步完善了教学行政组织。1917年12月,国文门教授会成立,沈尹默当选为教授会主任。教授会在早期的系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切与系科建设相关的事宜均由其规划决策,如教学方法及教学内容的制

定、教员会的组织、教材及教学单位的变更等。当时的国文门设有文学史及文学两科,1918年教授会制订的教授案对这两科的教学方法和内容分别做出了具体规定。明确“文学史在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文学则使学者研寻作文之妙用,有以窥见作者之用心,俾增进其文学之技术”^①。与此相应,课程的设置也由文学史和文学(诗文书赋)两大类构成。从1918年的课程表^②中,可以看出当时国文门各教授的教学概况和早期的课程安排:

姓 名	担 任 学 科	每周学时
刘师培	中国文学	6
	文学史	2
黄 侃	中国文学	10
朱希祖	中国古代文学史	2
	中国文学史大纲	3
钱玄同	文字学	6
周作人	欧洲文学史	3
	十九世纪文学史	3
吴 梅	词曲	10
	近代文学史	2
黄 节	中国诗	6

① 《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5月2日。

② 《北京大学文科一览》(1918年),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这一时期,大学中的文学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许多科目在此之前并无专业、系统的教材和参考书,教员多是一边编写讲义一边进行教学,编写讲义本身也是对自己学术研究成果的归纳和总结。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钱玄同的《文字学音篇》等著作都成于此时,刘师培的遗著《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也是他为讲授“文学史”一课而写作的讲稿。

现代高等教育中,文科各系的职能除了培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门人才之外,进行专业化的学术研究、建立新的学术规范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中国文学研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北大国文门(系)所从事的几项工作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如研究所的成立、方言的调查与研究、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建立等等。

1917年11月,北京大学本科国文门研究所建立。所中初设的科目有:音韵、形体、训诂、文字孳乳、诗、文、曲、词、小说、文学史等多种,学术研究与教学研究同时进行。1918年5月,研究所又改定研究科目为:(1)研究科:清代考订学、文字孳乳之研究、文学史编纂法;(2)共同研究科:字典编纂法、语典(语法)编纂法、今韵之研究、方言之研究^①。研究所注重研究员自动的研究,规定凡愿入所为研究员者和国文门二、三年级学生均可入所认定研究科目,并在主任教员的指导下进行研究。这就是北大国文门最早期的研究生教育。研究所的设立为有志于进一步从事高深学术研究的人才提供了进行专业研究的机会和条件,

^① 《研究所改定科目》,《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5月29日。